

出

版

史

料

CHUBAN SHILIAO

6



## 第六辑 目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怀念我国  
进步文化  
出版事业  
的先驱者——  
胡愈之同志

胡愈之同志生平 (2)

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 (5)

——胡愈之署长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  
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他象兄长、父辈一样关心我们 沈粹缜 (14)

追忆胡愈老几件事 柯灵 (15)

胡愈老关于出版工作的三次谈话 陈原整理、注释 (17)

胡愈之先生和开明书店 叶至善 (26)

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两先驱——

胡愈之与邹韬奋 邵公文 (28)

忆胡愈老 方行 (36)

悼念出版总署的好署长胡愈之同志 王益 (38)

怀念老师胡愈之 吉少甫 (43)

专题

良友忆旧录 马国亮 (47)

史料

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 赵家璧 (59)

人物志

李达与出版工作 熊崇善 李其驹 (74)

回忆录

延安出版工作零忆 韦君宜 (81)

读书生活出版社是怎样创建的。 汪仑 (83)

国讯书店史话 尚丁 (85)

书 刊 钩 沉	银幕旧闻拾遗	柯 灵 (91)
	——记《明星半月刊》	
	记《新文艺》月刊	蒋星煜 (98)
	——没有能和读者见面的一期创刊号	
	茅盾主编的《文联》半月刊出版始末	范 泉 (101)
	记《中国实业志》	冯和法 (106)
	商务的唯一科学性杂志——《自然界》	谢振声 (108)
版 本	解放前的盗版选本和作家自选集	倪墨炎 (110)
纵横谈	“签名本”谈屑	胡从经 (116)
略谈万叶书店		钱君匋 (121)
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六)		朱联保 (123)
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二)		林 熙 (126)
史料研究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	邹振环 (13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三)	张克明辑录 (136)
	(1938.3—1945.8)	
轶 闻 · 书 话	早期介绍孙中山革命运动的书(联)(14) 创办于监狱中的《红十月》(本刊摘)(25) 一九四六年上海木刻界对鲁迅的纪念活动(章西崖)(97) 吉鸿昌的两部著作(盛巽昌)(80) 《五年计划的故事》——吴朗西的第一本译作(丁言昭)(58) 邢昉《唐风定》的发现和刊行(孙琴安)(35) 钱君匋念亡友作楹联(夏弘宁)(27)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基民)(73) 清末出售《警世钟》的书店老板被拘押(朱联保)(130) 《歌谣周刊》(魏国峰)(42) 《东方寓言集》——第一部世界语童话译著(昌)(13) 夏瑞芳请外国技师革新商务印刷技术(宋丽荣摘译)(4) 光绪年间的售书广告(谷)(16) 张元济和母亲的深情(聊摘)(120) 乾隆帝下令重写清代历朝大臣传(锡培)(115)	
封二	胡愈之同志生前各个时期的照片	
封三	上海出版界东北华北参观团抵北京后和出版总署领导人合影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创办人伍联德先生的照片	

# 怀念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胡愈之同志

编者按：胡愈之同志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开创和发展人民的文化出版、文字改革事业和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胡愈之同志因病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出版界领导人，我们在短期内编选和组织了一组文章，其中包括《胡愈之同志生平》、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沈粹镇、柯灵同志在上海民盟市委悼念胡愈之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陈原、叶至善、邵公文、方行、王益、吉少甫等同志的纪念文章。我们相信，广大文化工作者、出版工作者定能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九八六年五月

## 胡愈之同志生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胡愈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十一时十五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胡愈之同志一九三三年九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而感到万分悲痛。

胡愈之同志一八九六年九月九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一九一一年后，他入绍兴府中学堂，受到鲁迅先生的熏陶。一九一四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刻苦自学。他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和民主。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一九二〇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一九二五年，他积极投入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行、集会和罢工活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还撰写《五卅运动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他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次日，激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共同签名，发表在《商报》上。在实际斗争中，他的思想、立场日益转变，倾向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他于一九二八年一月流亡法国，

入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并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一九三一年初，他在回国途中，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编《东方杂志》，利用这个阵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同时他与邹韬奋共同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并推动创办生活书店。一九三三年初，他应鲁迅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会执行委员，努力把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胡愈之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生活书店先后筹划创办了《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多种进步刊物，并亲自主编《世界知识》。这些刊物在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的情况下，成为进步文化工作者进行战斗的重要阵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他还推动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影响了一批青年投向革命。在《生活》周刊遭受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他又积极推动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并且通过杜重远做争取东北军上层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对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上海各界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胡愈之同志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

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逃亡到香港，一九三六年受党组织的派遣，经法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一九三六年四月返回香港，支持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不久又回上海从事支持救国会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他担负声援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组织律师为“七君子”辩护，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工具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他采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日爱国志士的反动行径。他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动了“救国入狱”运动，陪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自请入狱，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同志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还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并深入到群众中去，对难民、市民和工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在极端的困难条件下，以极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上海沦陷，他到武汉，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辛勤地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受周恩来同志指派，到桂林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通过继续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多种活动形式，使桂林很快成了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的迫害，他于一九四〇年七月撤离桂林到达香港。接着，他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同抗敌，并帮助陈嘉庚先生办《南洋商报》。他还组织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到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工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亚，新加坡危在旦夕，他在和郁达夫、沈兹九、王纪元、张楚琨等人到苏门答腊避难期间，写了《少年航空兵》一书，憧憬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他进行印尼语研究，编写了《汉译印度尼西亚辞典》、《印度尼西亚语法研究》等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愈之同志回到新加坡，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侨胞共同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一九四八年八月，他经香港到达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他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同志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他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的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和接待国外友人来访，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展民间外交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极力在我国提倡学习世界语，为推动世界语在我国的发展，增进中外世界语学者的友好交往费尽了心力。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

领导人之一，长期主持民盟的实际工作，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善于和党外同志合作，团结广大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民盟的进步和发展，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民盟广大盟员的尊敬和爱戴。三十多年来，他为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年浩劫中，胡愈之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拨乱反正以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和学习。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拥护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各项重大决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国内

外大事，敢于提出利国利民，清除弊政的建议。近几年来，他特别注意扶持年轻的同志承担第一线的工作，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接好革命事业的班。在病重期间他仍然关心着民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胡愈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战斗、全心全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对党忠心耿耿，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忠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和执行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作风正派。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榜样。他的历史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新华社北京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电）

· 轶闻 ·

## 夏瑞芳请外国技师革新商务印刷技术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很早就懂得印刷技术的革新对发展出版事业的重要性，因此他聘请了外国技术人员帮助采用印刷新技术，如一九〇三年，招聘日本技师前田乙吉、大野茂雄传入照像网目铜版；一九〇四年，招聘日本人柴田传入雕刻黄杨版；一九〇五年，招聘日本技师和田镞太郎、三品福三郎、角田秋成等人传入雕刻铜版。同年，又招聘和田镞太郎、细川玄三等八人传入彩色石印；一九〇八年，夏瑞芳购进平版印刷机，招聘日本人木村今朝南作技术指导；一九〇九年，招聘美国人斯塔福德（Stafford）改进照像铜版；一九一二年，传入电镀

铜版；一九一三年，又传入自动活字铸造机。

富藤惠秀在《初期的商务印书馆》一书中说：“这家《昌言报》，最初的三册全部是《时务报》时代那种铅字印刷的，到第四册，突然面目一新，三号活字变成了四号字，而且给人以比过去更鲜明的感觉。这是因为铅字质量好。仔细一看，从这一期起，目录的旁边印有‘上海北京路商务印书馆印’的字样。”这种字迹鲜明的印刷品，不言而喻是由于商务印书馆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的结果。

（宋丽荣摘译自〔日〕泽本郁马《商务印书馆与夏瑞芳》一文）

# 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

——胡愈之署长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一 人民出版事业在革命的战斗中长大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

从出版事业来看也是如此。

当全世界各国人民还在用泥版、芦草、羊皮之类当作书本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发明了造纸，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世界上第一本用白纸印上黑字的书就是在中国出版的，是我国人民劳动创造的成果。

勤劳的中国人民不但创造了优良的出版技术，而且用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干出版工作。版本的考据，书籍的校勘、编纂和翻译，很早就成为中国所特有的专家事业。我们要感谢前代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使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劳动生产经验一大部分得以保存到今天。

但是在从前，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出版事业的发展究竟是极有限度的。历史上



所有反动的统治阶级一贯地采取愚民政策。书籍典册被用来作为“载道”“卫道”的工具。所谓“道”，就是剥削阶级之“道”，封建地主阶级之“道”，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书本和知识为少数人所独占，出版事业也就没有大量发展的可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了石印、铅印、彩印，并且翻译出版了新学书籍。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中国又有了新式的印书馆、合资经营的书局和期刊杂志。这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刊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对初期的民主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虽然初期的出版业也沾染了资本主义的病毒，除了极少数优秀作品外，大部分书刊只是为了追随市场的需求，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并不适合人民大众的要求，但是出版、发行的企业化经营和印刷技术设备的近代化却在这一时期打下了基础。

至于新的人民出版事业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萌芽，配合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从战斗中长大起来的。五四以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走上反帝反封建的解放道路。从《新青年杂志》和《向导周报》开始，进步的书刊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和人民大众的要求相结合。革命的出版事业在当时力量还很薄弱，并且遭受反动势力的摧残压迫，但是它对于中国人民觉醒所起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国民党反动集团二十年的统治扼杀了中国人民的出版自由。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地区内，美国化的海淫海盗的低级读物，歌颂帝国主义、阿谀人民敌人的有毒书刊在市场流行，而为人民所需要的有益读物却遭受到严厉的检查 and 禁止。进步的书店、报社和杂志社被查封没收，人民的作家、人民的出版工作者遭受惨杀、拘禁和迫害，无法计算数目。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无论怎样残暴凶恶，到底不能阻止新的人民出版事业的成长和发

全中国的出版家作家翻译家艺术家  
一切编辑、制图、印刷、装帧、发行工作者们，  
团结起来，分工合作，统筹兼顾，紧密配合，  
前进！前进！  
上去，我们就要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  
出现于世界！

第二届全国出版会议

胡愈之

一九五〇年九月一五



展。一方面，进步的作家们和出版家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拿笔杆当作枪杆，拿纸弹当作枪弹，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在文化出版领域中，建立起不可摧毁的人民革命的营垒。这方面留下了两个伟大的名字——鲁迅和邹韬奋。

另一方面，革命作家和革命出版工作者，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就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起革命的出版事业的基础，在极端紧张的战争情况中，大量出版书刊，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工农兵的文化政治教育都做了出色的工作。毛泽东的旗帜成为革命出版工作者的旗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文化出版事业在国民党区日见衰落，在解放区不断发展。在物质条件十分缺乏的困难环境中，新华书店大批供应了优良的丰富的人民精神食粮，在大部分的解放区农村和解放军部队中，展开了革命书刊的发行工作，获得了

广大群众的欢迎。

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友邦苏联对于我国人民出版事业的大力援助。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我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一般干部理论水准的提高收到了极大的效果。

不可否认，三十年来革命的人民出版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号召、影响之下，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团结、进步和统一，曾经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成为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人民觉醒了，人民团结起来了，人民胜利了。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亡，人民政协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整个国家的完全统一，货币物价的稳定，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农村中以消灭封建剥削为目的的土地改革的稳步前进，城市中工商业的逐渐恢复和发展，所有这些创造了中国一切人民事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无限前途，也创造了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无限前途。虽然出版工作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有待于克服，可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出版事业的稳固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础是不可摧毁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向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先驱者、无数牺牲者和战士，表示崇高的敬意。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英勇的斗争和勤劳的工作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胜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 全国大城市解放后的出版事业概况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出版事业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堡垒，如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社等被人民接收。反动刊物停止出版。国营新华书店开始以城市为

中心，大量出版进步的书刊。工人和青年分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出版社。其他私人资本经营的书店自动肃清了在解放前印行的一部分反动书籍。封建迷信的、低级趣味的、于人民有害的书刊逐渐从市场上被驱逐。各种革命的、科学的优良读物在全国各地大量行销。出版事业现在不再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醉人民的工具，而成为新中国人民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战斗武器了。

新生的力量是活泼健全的，是有发展前途的。但是它还年青，还没有壮大，还有许多困难和缺点需要克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全国书刊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情况可以分作以下的几点来说明：

### 一 书籍的生产数量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五〇年一月到六月，全国出版书籍（不包括期刊），计初版新书二六一九种，重版书四二五七种，总印数为九五、二二四、五一六册。其中包含中小学教科书五七、六三三、一八六册。除去教科书不算，一般书籍的平均印数为六四一八册。

从这些数字来看，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书籍出版总数量虽然比解放前有了增加，可是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准。

据本年六月底的调查，全国公私营出版机关共计四二六家，但在今年上半年，只有一八五家出版新书。其他二四一家，生产是在停顿或半停顿中。

全国专印书刊的印刷厂，估计有百分之五十的生产力在目前是过剩的。这也说明了目前书刊的生产数量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准。

如果下半年出版数量和上半年相差不多，则一九五〇年全年全国出版的书籍杂志应为二万万册，平均起来，全国每二人或三人才有一册，比之于苏联今年度的出版计划，

全国出版总数为八万万册，还不包含期刊在内，平均每一人得到新书四册，差得多了。要是再拿每册书的容量多少和用纸数量来比较，我们目前的出版生产量大约和苏联相差十倍。

## 二 出版方向

出版总署成立以后，向全国出版家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初版和重版新书的样本，到七月底为止，收到的样书总计为四九六〇种，其中由公营、公私合营书店及机关团体出版的计二〇八八种，由私营书店出版的计二八七二种。

就出版物的内容来区别，所占百分比如下：

类 别	百分比
政治理论及时事	二〇·七
哲学、语文、史地	一一·六
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	一七·一
文艺	一八·九
学校课本	六·五
通俗读物	一八·一
儿童读物	五·三
其他	一·八

全国现在出版新书的一八五家出版业（除新华书店外，公营一家，公私合营六家，私营一六三家）中，出版文艺书籍的有九四家，其中三九家出版在五种以上；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有八五家，其中二八家出版在五种以上；出版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书籍的有三九家，其中一六家出版在五种以上；出版通俗读物的有八八家，其中三二家出版在五种以上。以上的统计是极不完全的。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出版的方向主要是出文艺书，其次是通俗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出版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书籍的不到出版家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七月底为止收到的九二八种的文艺书

中，文学理论占百分之七，文学创作占百分之三六，翻译作品占百分之三五，戏剧音乐美术占百分之二二。在文学创作中，新的作品不到一百种，大部分是旧的创作的重印本。翻译主要是苏联的作品，数量相当多，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特点。

社会科学书籍销行册数一般都比文艺书籍多。这是十分自然的。由于汹涌全国的学习运动的高潮，一般干部和新解放区的读者，对于政治理论书的要求要比对于文艺读物的需要迫切得多。包含十二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干部必读》已经全部出齐，印行的总数达三百万册。《毛泽东选集》的新版，由于校订和注释工作的浩繁，直到现在还不能全部付印。全国读者渴望已久了。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部巨著的出版将是中国出版界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情。

除了这些以外，属于社会科学和政治时事这一类的书籍，大部分是有关政策法规的小册子和活叶本。大部头的专门著作或译作并不多。政治时事读物在今年出版的，比去年的版本较为统一整齐，排印校对上的错误已经大大减少。但是这类书籍大部分是编选政策文件报告论文而成，内容往往互相重复。在目前的情势下，这是无法避免的。

出版界对工农兵通俗读物和儿童读物的重视，还不过是正在开端，但已经收获了相当大的效果。北京和上海方面，公私出版家大量地编印了通俗故事、曲本、唱本、连环画和其他通俗读物，在市场上逐渐挤掉了旧的有毒素的通俗读物。所欠缺的是内容方面狭，偏重文艺性，介绍科技史地财经常识的太少。这一工作继续干下去，是有极大前途的。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书籍的出版，还没有引起一般出版界的注意，在目前新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中，只有少数的译本和一些中级读物。关于财经和应用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出得很少。

解放以后，各种工具图书如字典、辞书、

地图等，需要十分迫切。许多旧的出版物必须重加订正。有些出版家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把旧的版本改头换面，草率印行，引起了读者普遍的不满和批评。出版家要是用严肃的、认真的态度，修订旧的，重编新的工具书，对于我们的读者是有极大帮助的。

学校教科书的出版，在解放以后，情形相当混乱。各地所用版本不一律，供应不及时，今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作出了决定，把小学用书及中学语文史地课本首先统一规定版本，并抑低书价。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央教育部和出版总署领导之下，将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但由于目前学制和课程标准还没有确定，在若干时期内，教科书的全国统一编印和统一采用，还不可能办到。因此，在目前，私人出版家编印教科书，由教育部审核后发售，是被许可的。

从一般来说，解放以后出版情况是完全不同了。公私出版业者现在都同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一般出版家都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发见了出版物有错误，往往自动改正或自动停售，甚至自动登报声明更正，虽因此遭受物质损失，亦无所顾惜。报纸对新书的批评介绍，也帮助了出版事业的改进。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已成为出版界的一种新风气，但是另一方面，出版物内容还显得不够充实，和国家的建设工作、人民的实际需要还不能密切配合。作家和编译工作者还没有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因而造成稿源的缺乏。某些盲目性的投机的旧作风有时还存在着，缺少计划性，重复浪费无法避免。为了纠正这些缺点，今后出版逐渐走向分工和专业化是有必要的。

### 三 书籍供应的情况

今年一月至六月，全国出版书籍九千五百余万册，总售价约为二千亿元。书籍销数

比解放前已大大增加。一般书籍在战前每年只能销一二千册，现在可以销五千至一万册。通俗读物和干部学习用书有时可以销到五万至十万册。这是解放前所不能想象的。

但是就我国领土的广大和人口的众多来说，目前书籍供应的情况还没有达到使人满意的程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人民的出版物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人民大众中间。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读者群还只是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级以上干部，适合工人、农民和战斗员阅读的书本子是太少了，即使有了一些，也没有普遍地在他们中间推销。

(二)我们的书店和发行机构依然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一带，很少到内地去干书籍的推销工作。在上海和北京，一条街上可以找到十余家书铺，但在新疆，人们要赶几千里路才能买到一本书。除老解放区一部分地区以外，在广大的农村中，书籍的供应是完全缺乏的。

(三)书价贵，买不起书。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纸张来源困难，造货成本高，出版和发行费用太大，远处运费贵，基本定价制度造成书价的混乱。此外，发行工作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四)全国还没有普遍建立图书馆或大众文化馆，使大多数缺乏购买力的读者无法和书本子接近。

(五)发行工作者和读者群众的联系不够，替读者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够。

这些情况是必须改变而且有可能改变的。国营新华书店改为专营书刊发行的机关之后，一方面对全国公私出版家担负起出版物的推销任务，另一方面也对全国读者担负起精神食粮的供应任务。新华书店和其他公私发行工作者应当联合起来，有计划地把书籍杂志尽量推销到基层的读者群，推销到工厂农村部队里去，推销到偏远地区，并且要加强和读者的联系，大规模展开读书运动。

除此以外,值得提起注意的,是杂志出版业和印刷业的目前情况。

杂志出版和发行的情况,一般都和书籍出版和发行的情况相类似。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现有期刊杂志二四七种,今年上半年总印数为一千四百万册左右,每期总销数为二百万份左右,其中销数达十万份以上的只有二种,十万份以下五万份以上的四种,五万份以下一万份以上的三十七种,其余销数都不到一万份,甚至有少至一千份左右的。在这里,重复浪费,缺少特性,缺少计划性是销数不多的主要原因。对于杂志出版业,今后提倡专业分工并使编辑方针与实际结合,是有必要的。

印刷业目前遭遇的困难要比出版家和书店的困难来得大。营业不振,也会影响到技术水准的下降和一般生产品质的低落。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是可以从各方面设法克服的。

### 三 新民主主义的出版政策和方针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总政策和总方针,其中也包含了出版政策和方针。这全部的政策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所应当共同遵守的,也是我们出版工作者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我们出版工作者,在执行行政或业务中,不可能有别的政策,只能有一个《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总政策;不可能有别的方针,只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即人民民主主义的总方针。

为了更深入了解新民主主义的总政策和总方针,以求减少顾虑,并避免发生偏向和错误,不妨就以下四项问题作补充说明:(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二)出版和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问题;(三)统筹兼顾问题;(四)分工合作问题。

## 一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

除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必要时期内被剥夺政治权利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充分享有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国民党反动政府过去所颁布的箝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令,现在已经废除。除了军管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特殊情形有必要者外,国家不采取原稿检查制度。

但是,仅仅取消了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消极限制,并不就等于充分保障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人民的国家有责任和义务领导并协助各阶级人民,从事言论和出版事业,使之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避免发生偏向和错误。由于此,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对于公私出版、印刷、发行业应当负领导和指导的责任,出版、印刷、发行业应向人民政府按时报告工作情况。人民政府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协助人民解决在出版方针和业务经营上所遭遇的困难。国营新华书店一方面应当担负全国人民所编辑出版的各种书刊的销售任务,另一方面也有责任联系广大的读者群,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公私出版家,以逐步改进出版物内容,消灭出版界的不良倾向。只有积极领导人民经营和发展正当的有益于人民的出版、印刷、发行业,才能使人民大众的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有了实质上的保障。把言论出版自由解释为国家对言论出版的不干涉主义或绝对放任主义,是错误的,是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方针不相符合的。

## 二 出版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问题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毫无疑问,人民出版事业的总方针也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但是要实施这一总的方针，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示了“在文教事业建设中应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一部分出版界，目前还残存着闭门造车的旧作风。目前我们的出版方向，和国家的需要是并不相符合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进行生产建设，而出版方面就缺少关于财经科技的书籍。一方面，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同志埋怨没有书本子可读，另一方面，我们的出版家却在愁无书可出。这不是很矛盾吗？要消灭这一矛盾，我们就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出版计划，这个计划要和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计划密切配合。此外，我们要求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各专业部门和各种专业的人民团体负责领导和协助我们的公私出版业，就各别的编辑出版计划，稿件的征集审核，予以必要的指示。我们也要求出版工作者接受有关政府机关团体的指导，按照此时此地人民的实际需要，从事编辑与出版。每一本书，每一册杂志，都要对于人民的精神物质生活，至少有一点一滴的贡献，而不只是为出版而出版。这样使出版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不但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在业务经营上，也确实可以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 三 统筹兼顾问题

正当的书籍杂志的出版、印刷、发行，毫无疑问，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在这里面，也包含了五种社会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国营的书店、出版社和印刷厂），合作社经济（即书报合作社），个体经济（即书摊、书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经营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这五种经济成分应当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长期

分工合作。人民政府对于私营事业并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扶助其发展，也是无可怀疑的。

目前私营出版、印刷、发行业一般都希望和国家资本合作，以解决其在业务经营上所遭遇的困难。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由于目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基本好转，私营企业中还存在着散漫的不合理的情形，国家不应当亦不可能根据单纯的救济观点，对私营企业加以普遍的资助。为了便于日后更进一步实行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作（其中包含国营企业加工，国营书店定货，公私合资经营等各种方式），私营企业应首先进行必要的改进和改造，改善本身的管理与经营方式，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某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可能范围内，实行联合经营，以便于国家的统筹兼顾。私营企业单纯倚赖政府或倚赖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协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国营书店对私营出版、发行企业采取关门主义是错误的，但是采取单纯的救济观点和迁就主义也是错误的。只有公私双方从全局着想，分别负责，发挥出版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做到真正的统筹兼顾。

### 四 分工合作问题

“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是克服中国出版事业中所残存的落后性，消灭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唯一有效的总方针和总办法，这个方针和办法的具体执行却是一件长期的细致的工作。所谓分工合作，包含了很多方面。首先是公营和私营、公营和公营、私营和私营的分工合作。其次是不同的经营范围的分工合作。这就是专业分工，其中包含了出版和发行的专业分工，印刷和出版的专业分工；而在出版业中又有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读者对象的专业分工，在发行业中有批发和零售的专业分工，在

印刷业中有不同的技术条件的专业分工。再其次，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合作和不同地区的分工合作。国家经济的整个生产流通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分工专业化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部分的分工专业化。特别是中国出版事业，由于历史的传统，一向保持手工业作风，缺乏分工和科学化的习惯，现在要具体实施分工合作，是一次大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大革命。因此，实施分工应当有重点，有步骤，分别出缓急先后，特别重要的是要照顾全局，而不可单从本位利益出发，片面地考虑问题。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业首先要实行内部的专业分工，同时给私营企业划出一定的范围。例如国家建立专业出版社，只抓住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来进行，而不是一切都包办。国营书店应当以担负批发任务为主，在没有必要时，不应无限制发展门市分支店，以免把私营中小书商挤垮。根据同一原则，国营印刷工厂在印刷业生产过剩时，也不应扩充机器设备，并应停止大规模建厂。至于私营企业的专业分工，应当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稳步前进。到了出版事业一般情况好转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向无限制的自由竞争的方向去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克服出版企业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才能真正做到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 四 怎样克服暂时的困难

中国人民出版事业是在发展的，在发展的途程中是有困难的。

这困难不是本质上的困难，只是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所残留的困难，也是国民党反动集团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困难。

所以这困难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期的。这困难是有办法克服的。

什么办法呢？还是前面说过的八个字：“统筹兼顾，分工合作”。

首先，中央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全国公私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领导和协助。全国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也要加强团结，和人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

国营新华书店改为专业的发行机构之后，要对全国出版家和书店负起更多的领导和协助的责任。新华书店应当用总批发、定货等方式，对于出版良好读物而经营困难的书店和出版家加以协助。它也应联合现有公私书店、书商、书摊、书贩，组织普遍全国的书刊发行网。新华书店对公私发行业进货、发货应同等待遇；对于农村中和偏远地区的书商、书贩尤应予以优惠待遇。

在目前，国营的出版社首先实行专业化。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出版机关也要确定分工合作的范围。公营的出版社，不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对于私营出版业都应当担负一定的领导和协助的责任，这就是说：委托加工，相互交换出版稿件，相互商讨编辑出版方针及计划等等。我们欢迎私营出版业逐步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但要根据各出版家的特长和自愿。专业化亦不应解释为对于某一专业的独占。任何出版家选定他自己所愿意的书刊出版应当是有自由的。为了使出版结合实际需要，各种专业出版社可按出版物性质、对象，和有关政府机关或人民团体分别联系，并接受其领导，以确定编辑出版方针，并协助供给组织稿件。

为了解决稿源的恐慌，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应当协助出版界，把全国作家和编译工作者组织并动员起来，特别应当组织工农兵作家，鼓励他们的作品的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出版家应当在可能范围内提高作家的待遇和写稿的报酬。

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出版机关加强编审部的人员和组织是有必要的。

发行工作和出版工作都必须密切联系读者。读者俱乐部和读书会的广泛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书刊的推销，而且对于出版物内容的

改进是有帮助的。一切负责的出版者都应当重视报纸的书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在出版事业中也是一样。

为了使书籍、杂志的销路增多，必须逐步降低书价，减轻读者的负担。出版、发行分工与出版专业化之后，发行与出版费用可以减省，书价有继续降低的可能。出版总署准备于有必要与可能时，选择公私营出版业出版的优良书刊，对某些读者予以适当的书价补贴，这样，一方面帮助了书刊的推销，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读者买不起书的困难。

基本定价制度造成书价的混乱。在目前物价已趋稳定，应当争取于不久将来取消基本定价制，改用统一的货币定价制。

印刷业在目前是有困难的。但是在明年书刊生产数量增加，困难可能大部分克服。在目前政府和工会应首先协助维持，并有重点地救济或训练失业工人。

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目前最大的难关是干部问题。我们希望出版界和政府合作，进行在职干部的政治教育与业务训练。全国总工会已经提议建立全国性的新闻出版印刷工会。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业应首先实行民主管理制，以提高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效率。

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考虑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各部门工作加强计划化。我们希望全国公私出版、印刷、发行业协助中央出版总署起草并保证执行明年度的全国出版计划。经初步研究，一九五一年度，为准备扫除文盲，推广

干部文化教育，出版书刊应以工、农、兵、青年、妇女通俗读物为重点。此外并应增加政治建设、生产建设所需要的出版物，同时改进学校教科书、工农课本的出版发行工作。出版总署并拟建立民族语文出版社，以使国内各民族都能用他们自己的语文大量出版书籍。此外，对海外的书刊供应亦在计划中。预计明年书籍刊物出版数量可比今年增加一倍，目前出版事业中的困难可以解决一大部分。在今后三四年内，相信出版事业可以获得基本的好转。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获得胜利。目前人民出版事业在发展途中所遭遇的困难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前途却无限光明。全中国的著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编译、审订、校对、排版、制图、印刷、装帧、发行工作同志们和广大读者们，团结起来，站在共同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战线上，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克服暂时的困难，稳步前进吧！我们要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实现毛泽东主席的科学预言：

“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原文载于《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  
兹为悼念胡愈之同志，重新发表于此。）

· 书话 ·

## 《东方寓言集》——

### 第一部世界语童话译著

《东方寓言集》是一部采撷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古老国家民间传说改写的童话集锦，系俄国作家陀罗雪维支（一八六三——一九二一）为讽刺沙皇俄国上层社会的昏暗和腐朽而创作的。

《东方寓言集》的最早中译本为胡愈之所译，系由世界语转译，共搜集《寓言的寓言》、《喀立甫与女罪犯》、《赫三怎样落下了裤子》、《错打了屁股》、《雨》

和《猪的历史》等六篇。原译作曾分别刊载于《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译者为了纪念柴门霍夫创立世界语四十周年，交由成立未久的上海开明书店，以“文学周报丛书”名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本书初版本封面，绘有一幅图案猪，呈灰黄色，盖与书里《猪的故事》一篇的内容相呼应。

（昌）



一月十六日晚上，我从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胡愈老病逝的噩耗，忍不住悲痛的心情，一个人在病房里哭了起来。

我和胡愈老相识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深深体会到胡愈老是韬奋的挚友和亲密的同志。是他首先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和教育了韬奋。二十年代末期，韬奋接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生活》周刊。这个刊物从初期侧重于个人修养教育和职业指导，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阵地，“九·一八”事变后，成为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人民喉舌”，这个转变是和胡愈老的积极帮助分不开的。以后，胡愈老又支持韬奋创办《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等进步报刊。在韬奋转变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着胡愈老的扶持和帮助。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而胡愈老亲自为书店起草了生活合作社章程，拟定了进步的出版方针、出书计划，并组织许多进步作家为书店撰稿，从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在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生活书店能成为进步文化的一个堡垒，与反动派作斗争，这都是在胡愈老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君子”被捕，胡愈老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声援营救“七君子”。该案是一九三七年六月在苏州审理的。有名的《爱国无罪听审记》一文，就是胡愈老在审问的当天，坐镇上海，晚上生活书店张仲实等同志赶回上海将听审的详细情况，向他汇报。胡愈老边听边写，挥笔直书，写了一部分，即油印数份，派人送各报馆，分四批才送完。赶在第二天见报，及时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迫害爱国志士的反动行径。胡愈老还发动爱国入狱运动，亲自陪同宋庆龄等著名爱国志

士赶赴苏州，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暴行，那天的情景，我是亲眼目睹的。

胡愈老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从事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领导人。

---

## 他 象

---

### 兄长、父辈一样 关心我们

---

沈粹缜

（按：以上是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同志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为追悼胡愈之同志而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沈因病住院，发言稿由其女邹嘉骊同志宣读。）

· 轶事 ·

---

## 早期介绍孙中山 革命运动的书

一九〇三年上海国学社出版了一本《三十三年落花梦》。该书是日本白浪庵滔天（宫崎寅藏）所著，由金一（即金松岑）翻译的，内容记孙中山早期参加革命的经过甚详。

（联）